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陈漱渝 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HUA XIANXIANG

再读 胡适

Z A I D U H U S H I

欧阳哲生 / 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再读胡适

欧阳哲生 编

陈漱渝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读胡适/欧阳哲生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4

(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ISBN 7-80094-978-8

I. 再…

II. 欧…

III. ①胡适(1891-1962)-文集

②胡适(1891-1962)-学术思想-研究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369 号

再 读 胡 适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60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094-978-8/B·7

定价:22.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市场经营部 电话:84040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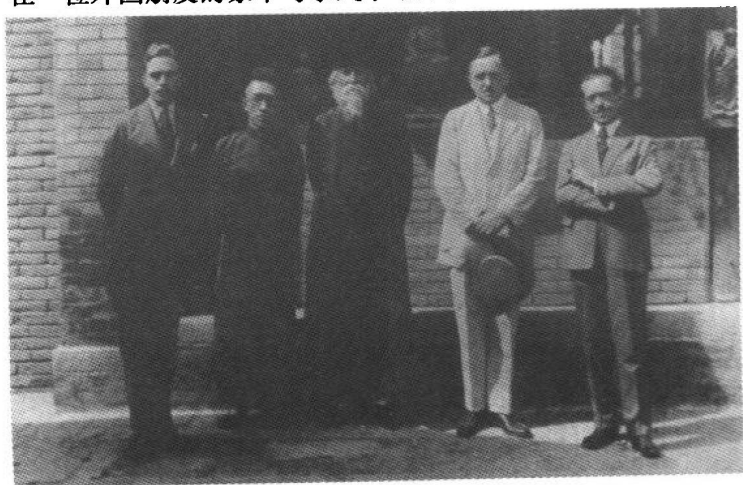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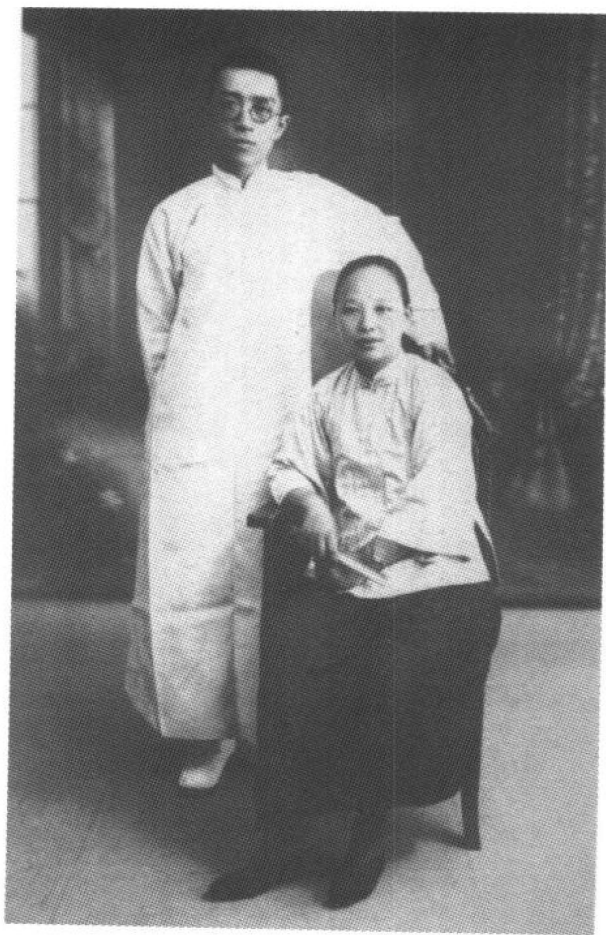
1909 年的胡适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胡适单人照片。胡适自署摄于 1909 年，胡适时年 18 岁。此照片是送给他的好友胡平(字逸坡)的。胡平死后，其家属将此照片交给胡适收存。

与泰戈尔等合照

1924 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 (R. Tagore, 1861—1941 年) (左三) 来华访问，胡适(左二) 在一位外国朋友的家中与泰戈尔晤聚。





与夫人江冬秀合照

胡适 1917 年初回国时，其母即要求他与苦等了 14 年的江冬秀完婚。胡适于当年 12 月回家完婚，第二年始将江冬秀接至北京。江家是名门大户，但却不重视女学，以致江冬秀识字不多。跟胡适结婚后始努力识字，略能写信达意。



为胡适塑像

1932年1月，胡适到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会议，住在礼查饭店。恰好他的朋友美国美术家贺福曼夫人亦住在此饭店。图为贺福曼夫人正为胡适作雕像。



“芜湖的乞丐”

20年代胡适在安徽芜湖长江边上拍下的一张照片。胡适自署为“芜湖的乞丐”。实际上可能是逃难的灾民。

前 言

——胡适的文化世界

欧阳哲生

在历史上,我们常常赋予那些在一个时代起着关键作用或导向意义的人物以特别显赫的地位,甚至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位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历史人物,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或象征。胡适无疑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之一。

中国人文学术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酝酿新的突变,其变化更新主要出自二途:一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寻找新材料,拓展新领域,借用新工具,发展中国人文学术,使之获得新的生命力,此谓推陈出新。一是通过传播外来学术文化(主要是欧美科学文化),扩大国人的视野,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所谓援西入中。两途并非判然有别,而是相互影响。外来学术文化为人们重新认识、整理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遗产提供新的借鉴,本民族习惯的思维模式和兴趣爱好又制约着人们对外来学术文化的选择和理解。它们构成推动中国人文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双重动力。

这一文化转型是与几代中国学人的持续努力和辛勤劳作分不开的。大致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至1915年,此时西学传输已初步展开,国学(特别是经学、子学)研究渐露新机,是为新学之草创阶段。这一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孙诒让、夏曾佑、罗振玉、王国维诸人。如论其影响力,当首推梁氏;而以治学之邃密,成就最具创获性,则应认王国维。从1915年至三、四十年代,西方各种新的主义、新的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学术界,国学研究层面大为扩展,新的学科体系逐渐建立。中西交融,古今错落。此期大家荟萃,各有专精,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钱穆的史学研究,董作宾、李济的考古学研究,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钱玄同、赵元任、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欧阳渐、吕澄、汤用彤的佛学研究,冯友兰的哲学研究,金岳霖的逻辑学研究,……他们学有所守,相互切磋,建构了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基本框架。平心而论,若论对此一时期学术文化之风气影响最巨者,则无出于胡适之右。

胡适属于通才型的大家。他常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其论学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民俗学、宗教等领域,在学科分工日趋专业化的现代,如以某一学科的具体成就而言,也许不难找到与胡适匹敌,甚至超越胡适者;但像胡适这样在诸多领域取得一流的成绩,或发生重要影响,确实属罕见。

胡适一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1891—1917年)、前期(1917—1937年)和后期(1937—1962年)。

早年是胡适学业的准备阶段。这时期他在家乡经历了九年的传统教育(1895—1903年),在上海梅溪、澄衷、中国公学等处接受了七年不中不西的新学堂教育(1904—1910年),然后赴美

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0年9月—1917年7月),受到西方现代学术训练。胡适的求学过程可谓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型的一个缩影。其中在美的七年留学生涯,又为他学业成长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七年,胡适不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而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志业坚实的基础。一部《胡适留学日记》是他这段生活的自供状。只要把胡适的这部日记与当时中国国内的学术文化的状况作一比较,即不难看出他思想超前的一面。后来亦留美的梁实秋先生曾感慨地说:“我读过他的日记,深感自愧弗如,我在那个年龄,还不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我当年也写出一部留学日记,其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①可以说,胡适的“暴得大名”自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但与他本人优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的相对超前分不开。

胡适成为现代中国一个文化巨人,首先是因他的名字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讲到新文化运动,多年来各派、各党之间曾就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发生过争议和辩驳。然证之于历史事实,以当时的作用和影响而言,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人可谓举足轻重。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中国文化的革新运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这一运动拉起民主(人权)、科学的大纛;蔡先生整顿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独立”的治校方针为新思潮、新文化护航;胡适在这时期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尝试集》、《胡适文存》等著作,以其多方面的、创获性的文化成就为整个运动提供了典范。关于

^① 参见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

这一历史情形,陈独秀晚年曾有明白的交待:“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

胡适自谦“但开风气不为师”,其实新文化运动作为克服民族文化危机的“文艺复兴运动”,其职责即是创造新的文化范式(Pattern)。这种新的范式具体体现于新文化运动,一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建构新的学科框架;一方面又通过新的成果、新的人格精神,提倡工作典范和道德模范。但既然是雏形,就相对粗糙,需要精雕细琢;既然是框架,就留下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在文学和道德两个领域取得突破。所谓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胡适的先导作用亦是表现在此。在文学领域,他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继后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论短篇小说》等一系列理论文章,为新文学的发展铺垫理论基础。他身体力行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尝试,写下了新诗的第一部拓荒之作——《尝试集》。他最早推出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短篇小说》第一集,这在当时也是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般论者认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成绩以短篇小说和新诗两种体裁为最大,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谈新诗》在指导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几乎是短篇小说和新诗的金科玉律。他创作的《尝试集》和翻译的《短篇小说一集》在

^① 参见《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原载 1940 年 3 月 24 日《中央日报》。

“五四”时期也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胡适主张建设新道德。他宣传易卜生主义,极力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主张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权,主张妇女解放,主张对旧的家庭制度进行改革,主张对陈旧的陋习进行革新,这些在当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是“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动力。“五四”时期的一代新青年奉胡适为自己的导师,正是基于此。应当说明的是,胡适是个性解放的积极倡导者,但他的个人私生活又表现得相对严肃,以至成为各方面能够接受和容纳的新派人物。这也反映出胡适本人在新道德建设中较为成熟的一面。

在思想领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实验主义》长文,并借其老师杜威来华讲演的声势,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即“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提倡“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哲学武器,这也是现代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卓越表现与他的学术成就密不可分。胡适在学术研究中所创造的实绩,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为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范式,现代学者公认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成立的标志。此书的优长诚如蔡元培先生序中所言:“第一是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作者时代,辨别著作真伪和揭示各家方法论;“第二是扼要的手段”,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各家的长短“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四是系统的研究”,显示各家“递次演进的脉络”。^①《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这些特点恰好反映了胡适治学的两面,即继承清代汉学考

^① 参见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证方法的一面,现代学术理念的自由意识、历史意识的一面。

胡适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学术成绩是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先生与胡适关系密切,胡适督促其整理、出版新的中国古典小说本子,其内容包括:一是给原文加上标点符号,二是给原文分节分段,三是在正文前写作一篇介绍该书历史的导言。^①这项工作胡适亲自动手,从《儒林外史》开始,然后是《水浒传》,影响最大的是《红楼梦》。胡适为该书所作的前言——《红楼梦考证》,首次提出《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体小说,一时激起巨响,此文的刊发标志着新红学的崛起。胡适的古典小说考证这一工作的意义“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为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将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一顾的古典小说提升到现代学术殿堂来研究,胡适当有开创之功。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强调新文化运动之创新的一面。殊不知这一创新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创获对后来中国文化学术的趋向有影响者,如他拓展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实为将乾嘉汉学的考证方法运用到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他提倡的白话文也不过是长期流行于民间的口头话语;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亦大量采用清代汉学家的考证成果;他倡导的“整理国故”更是与乾嘉汉学——清末国粹派的活动一脉相承。因此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抉择不仅应看到其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亦当重视它与中国人文传统相联系和发展的一面。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概括为四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本人也是在这四个层面展开自己的活动。

^① 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从旧小说到新红学》。

“五四”以后,胡适曾发起并身体力行“整理国故”。关于这场运动,我以为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一是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强调历史科学的实证性;二是拓展历史研究的材料和范围,将历史研究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三是大规模地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系统地研究和清理,对前人所存在的一些误判和疑误重新予以研究。二、三十年代,胡适先后撰写并出版了《胡适文存》(二、三集)、《胡适论学近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哲学小史》、《戴东原的哲学》、《章实斋先生年谱》等论学著作。其工作范围大致可归于“整理国故”。从知识增量的角度看,胡适这时期的学术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典小说考证。胡适除先前对《儒林外史》、《水浒传》和《红楼梦》三书考证外,这时期还对《西游记》、《镜花缘》、《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醒世姻缘》等书予以考证和评介。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亦有一些新的研究材料发现。胡适的考证主要涉及这些作品的作者、版本源流等文本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小说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其小说考证颇受行家重视。1940年3月,蔡元培先生逝世,中研院长空缺,陈寅恪极力推荐胡适,他认为胡氏的中国古典小说考证和研究,在国外的学术界很有影响。^①

二是文学史研究。胡适先是利用在国语讲习所讲课的机会,写作了一部《国语文学史》书稿,后又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修改、扩充,写作了一部《白话文学史》(上卷),其中提出了双线文学的观念,即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和由御用文人写作的

^① 参见邓广铭《邓广铭文化学述随笔》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的发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僵化的死文学。这成为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中心观念,亦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革命性理论。

三是禅宗史研究。1924年,胡适动手写《中国禅学史》稿,写到慧能、神会时有所怀疑,便决心搜求史料。1926年在巴黎、伦敦他发现了神会的三种语录和《显宗记》,其后他层层挖掘、步步深入,发表一系列研究禅宗史的文章,如《禅学古史考》、《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菩提达摩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论〈牟子理惑论〉》、《陶弘景的〈真诰〉考》、《〈四十二章经〉考》、《楞伽宗考》、《〈楞伽师资记〉序》、《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等,编校《神会和尚遗集》,胡适可以说是利用敦煌史料研究禅宗史的第一人,他的有些论断,如南宗“实自菏泽始盛”,充分肯定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亦为同行们所公认。他提出的一些看法虽引起争议,并曾在禅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这一情形本身亦是对禅宗史研究的巨大推进。^①

四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二、三十年代以后,胡适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逐渐推向中古和近世。这方面他的著述主要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和有关宋明清代思想家李觏、费氏父子、戴震等。其中他所写的《淮南王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的一章)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最能反映他本人的思想性格。看得出胡适是有意想继续写完他的中国哲学史,然因种种原因而未遂其愿,《中国哲学史大纲》只留下半部书,此事常遭人讥议,梁漱溟先生甚至说:“他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教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梁先生

^① 参见高振农《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207—219页,上海社科出版社出版。

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胡适写中国哲学史的困难实为其学风所限。胡氏重视史事辨析,他与汤用彤等北大系的哲学研究者以为中国的哲学研究当从弄清哲学史入手,不可贸然建立哲学体系,他们与清华大学的冯友兰、金岳麟这一派人不同,其哲学研究均以哲学史见长。研究哲学史又强调哲学史料之辨析,故其所作哲学史往往又只能是断代的,或个案的。以这种做法写通论性的中国哲学史,自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五是关于先秦诸子的历史考证。胡适自1915年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向汉学界的最高权威章太炎提出挑战,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其后写作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主要是对先秦诸子的历史与思想进行研究,其中一些看法(如关于老子的年代)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二、三十年代他继续花大力气研究先秦诸子,曾就《墨经》问题与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讨论,就老子年代问题与梁启超、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人展开辩论,就儒的起源对章太炎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是子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家。他的一些观点,如老子先于孔子,已被现今的考古新发现所验证。

胡适的学术研究至30年代中期,可谓步入了高峰。遗憾的是,此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的工作发生了异动,其学术发展势头也随之受到了抑制。

1937年抗战开始以后,胡适受命赴欧美做外交工作,开始了其人生的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胡适担负了一些重要公职,如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8—1942)、北京大学校长(1946.8—1948.12)、“中央研究院”院长(1958—1962)等职。其中担任驻美大使这一职务,明显地消耗了他不少的精力,以至他积劳成疾。即使在他赋闲的两段时期(1942—1946.7,1949.4—1957),胡适也是闲居在美,与国内的知识界关系不大,这亦使他失去了

与国内学术界对话和相互切磋的语境。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文学术经过多年的积累，由“五四”时期的初创向更为细密、更具独创意义和更具民族特色的高一阶段攀升，产生了一批经典意义的新成果。如冯友兰之《贞元六书》，金岳麟之《知识论》，陈寅恪之《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胡适工作异动的另一影响是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应有的重心。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蔡元培先生的逝世，蔡先生的去世使中研院长一职空缺，这本是胡适回国的好时机，国内的许多人亦抱持希望。然蒋介石却以朱家骅补缺，这一任命不啻使国内知识分子失去一重心。朱氏与负责西南联大的蒋梦麟虽具行政才干，但因其与国民党关系过密，很难起到聚合自由知识分子的作用。本来北大与中研院既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又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当局对其刮目相待。蔡先生去世后，以资望和学术地位衡量，胡适当是合适的替补人选，蒋氏无意安排胡适，意在将北大和中研院纳入“囊中”。故抗战八年胡适旅居美国，于其个人学术研究是一大损失，于中国知识界亦未尝不是一难以弥补的缺憾。

胡适卸任后旅居美国时的学术工作主要是从事历史考证，其中最为人乐道者是他的《水经注》考证，胡适研究《水经注》，其意是为其乡贤戴震翻案，既推翻近二百年来许多权威学者所认定的戴震抄袭赵一清、全祖望的校书疑案，这是一项几无思想活力的研究工作。故其无论是成是败，都不具学术前沿的性质。四、五十年代，胡适倾注心力从事《水经注》研究，在大量的演讲中以宣传自己《水经注》考证为主题，然这一研究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相比，影响力却极为有限。此外，这一时期胡适在汉魏史事的历史考证、禅宗史研究、治学方法等方面，也留下了不少文字。50年代后期，胡适曾有意完成自己